

# 探討「財政健全方案」之經濟效果

洪振義、吳偉文、李見發、劉晉宏\*

## 要 目

壹、前言	肆、實證結果
貳、文獻回顧	伍、總結
參、研究模型的建立	

## 提 要

1997 年亞洲貨幣危機與臺灣本土型金融風暴，造成民營銀行逾放比大幅攀升。政府為改善銀行財務結構，調降金融業專屬本業銷售額適用之營業稅率，由 5% 調降為 2%，以打消銀行巨額呆帳。鑒於銀行經營體質已趨於完善，行政院在 2014 年 2 月 27 日提出「財政健全方案」解決日益困窘之政府財政。本文分析「財政健全方案」適時調整稅制措施產生之經濟波及效應，實證結果顯示具正面及相當水準之經濟效果。

## 壹、前言

法國政治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曾說：「財政是國家的神經」。另一方面，「金融是經濟的血液」。因此，一旦財政與金融發生問題時，國家經濟將會面臨重大的考驗。

從 90 年代起，我國為了加入 WTO 推動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核准 15 家新銀行設立，使得金融市場產生極大變化。金融市場自由化使得國內銀行業之經營由過去的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客戶對銀行增加了許多選擇，同時也造成銀行

\* 本文作者分別為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大華科技大學商務與觀光管理學院教授、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及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之間的劇烈競爭。目前我國存在的金融機構，一般銀行 39 家，中小企業銀行 3 家，外國銀行在臺灣分行 32 家，信用合作社 28 家，農會信用部 254 家，漁會信用部 25 家，如果將各金融機構分行合計將近 6,000 家。

我國是小型海島經濟體，商品市場或資本市場皆屬於淺層市場型態，過剩的金融機構壓縮銀行利潤，也使原有存、放款市場因新銀行設立而改變其市場占有率。一開始新銀行為擴大授信市場規模與占有率，紛紛採取調低徵信及授信品質，並積極增加放款額度與降低放款利率等優惠條件爭取客戶做為擴張貸款之經營策略。舊銀行為維持客戶與消化過剩資金，增加放款規模做為提升市場占有率及增加營業收入。

金融機構快速增加與金融經濟擴大，提高金融市場不穩定性。加上各家銀行為了提高營收及市場占有率，採取寬鬆貸款策略，結果造成逾放比率（Non-performing Loan Ratio）攀升，全體銀行逾放比率超過 10%，為避免銀行產生過多呆帳，於 1999 年 7 月透過調降金融業專屬本業銷售額適用之營業稅稅率由 5% 調降為 2%，以調降 3% 部分充當打消銀行鉅額呆帳。並於 2001 年 6 月 27 日通過「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以公共資金挹注方式成立金融重建基金（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RTC）做為保障存款人權益及改善問題金融機構財務缺口，解決系統性金融危機之發生。

2001 年全體逾放金額（Non-performing Loan Amount）高達新臺幣 1 兆 3,274 億，其中商業銀行（commercial banks）占 1 兆 870 億元，而基層金融之農會與合作社也分別占 1,314 億元、497 億元。如以逾放比率來看，商業銀行為 7.48%，農會與合作社更高達 19.33%、11.66%。而隨著 RTC 之運作，銀行逾放比率獲得明顯改善。將金融營業稅（3%）專款挹注於 RTC，以做為處理問題金融之存款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及銀行業以外之金融業特別準備金<sup>1</sup>之用。歷經 8 年努力，2008 年商業銀行下降至 1.54%，農會與合作社則為 6.52% 和 1.24%，在 2013 年底為止，商業銀行、農會與合作社之逾放比率各為 0.36%、1.53% 與 0.14%，皆已達到穩定之經營標準，紓緩全球金融危機對臺灣金融機構之衝擊，如表 1 所示。

---

<sup>1</sup> 截至 2013 年底，已經投入於金融業營業稅稅款、存款保險賠款準備金及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賠付金額超過 3,762 億元，處理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共計 57 家。

表 1 金融機關逾放比例

單位：%

年份	總體 逾放比率	本國銀行 (含信託投資公司)	本國銀行	外國及大陸地區 銀行在臺分行	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信用部
2001	8.16	7.70	7.48	3.53	11.66	19.33
2002	6.84	6.39	6.12	2.36	10.34	18.62
2003	5.00	4.57	4.33	1.51	6.91	17.57
2004	3.28	2.95	2.78	1.03	3.17	14.46
2005	2.19	—	2.24	0.75	2.09	10.92
2006	2.08	—	2.13	0.69	1.55	8.13
2007	1.79	—	1.84	0.74	1.29	6.25
2008	1.52	—	1.54	1.20	1.24	6.52
2009	1.14	—	1.15	0.91	0.85	5.60
2010	0.60	—	0.61	0.22	0.57	4.09
2011	0.42	—	0.43	0.13	0.41	3.03
2012	0.39	—	0.40	0.01	0.27	2.21
2013	0.36	—	0.38	0.01	0.14	1.53

資料來源：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資料 (<http://www.cdic.gov.tw/ct.asp>)。

RTC 之設置與金融營業稅之善用，使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雖然重創我國出口，<sup>2</sup>但金融機構則相對穩定，此即財政政策靈活運用之結果。另外，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因經濟受到嚴重衝擊，政府提出一連串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前者為連續調降 7 次利率水準，後者則以消費券發放、中長期就業促進方案、政府機關雇用擴大、減稅措施（個人所得稅扣除額提高，遺產稅減免等）、放寬中國觀光限制、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以及放寬都市開發的投資等七大景

<sup>2</sup> 我國 2008 年第 4 季出口相較前年衰退 24.7%，衰退幅度遠較其他國家大，新加坡-13.9%，日本-9.9%，韓國-9.9%，香港-1.8%，菲律賓-22.5%，馬來西亞-12.6%，泰國-8.5%，印尼-6.2%，只有中國為正成長 4.3%，但成長幅度則大幅下降，特別 11 月，12 月呈現負成長，分別為-2.2%，-2.8%。進入 2009 年後第 1 季與第 2 季經濟成長率與前年相較分別衰退 10.24%及 7.54%。我國因金融危機出口受創，輸出結構的不同，所受程度亦不一樣，需視出口產業性質而定。依照出口產品性格，容易受世界景氣好壞影響為「中間財」(Intermediate goods)與「資本財」(Capital goods)，較不受影響者為「基本素財」(Primary goods)與「消費財」(Consumption goods)，換言之，不同性質的出口商品與世界景氣連動性存在差異。依「みずほりレポート—世界金融危機とアジア経済」(2009)資料顯示，各國與世界景氣連動係數，「中間財」(零件)為 0.657，「資本財」為 0.602，「中間財」(加工品)為 0.586，「消費財」為 0.389，「基本素財」為 0.309，連動係數愈大愈易受影響。

氣對策最為社會所重視。這些景氣對策超過 7,000 億元規模，金融危機之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負擔，然而財政健全與否攸關國家未來發展。鑒於銀行經營體質已趨完善，行政院爰於 2014 年 2 月 27 日提出「財政健全方案」，以解決日趨嚴重之財政困境。

「財政健全方案」包括三大主軸，分別為控制債務規模、調整支出結構及統籌可用財力資源與多元籌措，並分成八大項目，分別如下：<sup>3</sup>

- 一、控制債務規模，不讓債限破表。
- 二、調整支出結構，包括：
  - (一) 檢討法律義務支出、各項年金改革及非法律義務支出
  - (二) 引進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
- 三、統籌可用財力資源，多元籌措：
  - (一) 提升公股事業經營效率
  - (二) 檢討民營化與釋股政策
  - (三) 全面推動資產活化
- (四) 落實使用者付費
- (五) 適時調整稅制，檢討不符國際趨勢及不合時宜稅制

由上述內容觀之，「控制債務規模」與「調整支出結構」屬於「節流」財政，而「統籌可用財力資源，多元籌措」則為「開源」財政，「開源節流」為「財政健全方案」之基本思考，為解決財政困境之策略。不管是「開源」或「節流」，財政改革進程分成短期與長期，係因推動方案需要法律與制度配合方可達成，時間因素增加「財政健全方案」達成之不確定性。此外，在「財政健全方案」項目中，有些目標難以設定具體數據水準，最終目標如無法明確說明要達到何種程度才算達成「財政健全方案」，將使評價「財政健全方案」失去客觀性。

基於上述考量，本文以能在短時間反映及客觀性之項目評估，推算第三主軸第 5 項「適時調整稅制」改變所產生之經濟影響。包括：

---

<sup>3</sup> 財政部國庫署(2014)「推動財政健全方案」，<http://www.nta.gov.tw/web/ContentB/ContentB.aspx?c0=427>。

1. 「恢復銀行及保險業營業稅率」
2. 「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
3. 「修正綜合所得稅稅率結構」
4. 「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適時調整稅制」為改變稅率或稅額之稅制改革方案，主要係修正所得稅與營業稅。在金融危機前，所得稅與營業稅稅收所得彈性值分別為 2.38、4.16，<sup>4</sup>皆大於 1，表示稅收變化率大於經濟成長率，顯示當前稅制有利於稅收成長，當經濟成長率愈高，稅收效果越明顯。因此，未來經濟如能順利發展，理論上政府所推動之「適時調整稅制」方案將產生明顯稅收效果，有助於財政開源。

財政部亦對該方案進行初步效益評估，<sup>5</sup>然而這些評估數據背後尚隱含經濟波及效果，本文將設定各種情境，透過數理模型推估「適時調整稅制」所產生之經濟波及效應。

就理論言之，「適時調整稅制」方案之實施將直接影響個人家庭可支配所得及銀行與保險業營收，進而影響個人家庭與企業之經濟行為。本文假設：1.稅制調整方案可增加稅收，並將增加之稅收用於救濟之移轉性支出或投入公共建設；2.恢復金融機構營業稅率為 5%，將不影響金融業者之盈餘提存及投資計畫；3.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及綜合所得稅稅率結構修正，不致影響個人投資與消費。政府稅收移轉予不同所得家庭時，由於消費型態不同，<sup>6</sup>所產生之政策效果亦有不同，因此政府「適時調整稅制」方案對不同所得水準之個人家庭所產生之經濟波及效應亦不相同。<sup>7</sup>另「財政健全方案」所增加之稅收用於移轉性支出或投入公共建設，所帶來之經濟效應亦有所不同。本文研究目標設定如下：

<sup>4</sup> 推估 2007 年稅收所得彈性值 ( $\eta_{T_j}$ ) 計算公式為： $\eta_{T_j} = \frac{\Delta T_j}{T_j} \times \frac{Y}{\Delta Y}$ ，其中  $T_j$  表示  $j$  稅稅額， $\Delta T_j$  表示  $j$  稅稅額變化量； $Y$  代表國民所得， $\Delta Y$  為國民所得變化量。

<sup>5</sup> 依據財政部『回饋稅制福國利民』（2014），恢復銀行及保險業營業稅率為 5%，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與修正綜合所得稅稅率結構等措施可以增加國庫收入 700 億元。另一方面，配套措施當中，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將使國庫稅收減少 73 億元，中小企業增雇薪資費用加 3 成減除可帶動就業人口增加。

<sup>6</sup> 依據 2012 年『家庭收入調查報告』數據計算得知，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之平均消費傾向為 0.79，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之平均消費傾向為 0.90。

<sup>7</sup> 根據 2012 年資料計算，家庭所得從低而高的 5 等分之平均消費傾向分別為 0.9、0.78、0.71、0.66 與 0.53，可知家庭所得越高者其平均消費傾向就越小，所產生之經濟乘數亦不相同。

- (一) 推估稅收用於移轉性支出之經濟效應。設定移轉性支出以所得最低 20% 家庭為對象。
- (二) 推估稅收用於公共支出之經濟效應。
- (三) 推估提高特別扣除額之經濟效應。

## 貳、文獻回顧

Solow (1956) 認為經濟成長僅受外生技術影響，1980 年代中期 Romer (1989) 提出內生成長理論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分析經濟成長。Barro (1990, 1991) 更進一步將政府財政收支行為納入內生性成長模型中，證明政府財政政策能有效提升經濟成長。Koester and Kormendi (1989) 採用簡單迴歸分析平均稅率與邊際稅率對經濟成長之影響 (63 個國家於 1970 年至 1979 年間資料)，實證結果顯示平均稅率與邊際稅率對經濟成長影響呈負向關係。Milesi-Ferretti and Roubini (1998) 研究顯示，資本所得稅對經濟成長影響因素，在於人力資本累積，以及人力資本部門是否免稅而定。研究指出，如果實體資本受人力資本累積影響時，資本所得稅對經濟成長產生負面影響。反之，則資本所得稅不會長期影響一國經濟成長。

江振南、陳韻如 (2004) 以向量自我迴歸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 模型，實證分析臺灣 (1952-2002) 經濟成長。研究顯示消費稅對經濟成長之關聯性較大，有利於經濟成長，而所得稅與經濟成長關連性則較小。該研究更進一步指出，以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顯示，經濟成長對各項稅收具明顯影響。另一方面，消費稅對經濟成長之影響較所得稅為大且呈正向關係，而所得稅對經濟成長之影響則為負向關係。以公共支出、租稅與人力資本討論對經濟成長影響文獻中，Mendoza et al. (1997) 以消費稅、資本所得稅及勞動所得稅為解釋變數分析經濟成長，結果發現此 3 種稅制對經濟成長影響並不顯著。另外，在公共支出、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三者間之關係，公共支出將透過人力資本變化影響經濟成長率，Sylwester (2000) 認為此傳遞過程所產生之效果可視公共支出對經濟成長的間接效果所致。

在稅制與人力資本間之關係，Trostel (1993) 研究指出，人力資本與比例所

得稅呈現顯著負相關。而 Heckman (1976) 認為透過實物資本之傳遞，人力資本與所得稅制則會產生正向效果。King and Rebelo (1990) 及 Rebelo (1991) 也指出人力資本與稅制結構呈現負向關係，而 Lucas (1990) 則認為租稅課徵與人力資本呈負向效果，盈餘稅造成淨工資率下降。而 Engen and Skinner (1996) 認為較高之公司、個人所得稅與資本利得稅皆降低投資率與私人資本存量淨成長，間接影響經濟成長。

Dotsey (1990) 假設在訊息完全自由、隨機模型下，當稅率下降時，相對產生資本存量提高、實質利率上升、投資額度上升之替代效果，主張稅率下降對經濟成長產生正面影響。

Easterly (1993) 以開發中國家為分析對象，指出過度依賴關稅保護所造成扭曲現象將對經濟成長產生不良影響。然而 Creedy and Gemmell (2005) 以人力資本累積之內生成長模型，說明當消費稅稅率越高，且稅收投入於人力資本與實質資本，將增加國家生產力，惟同時指出消費稅稅率越高所帶來之負面勞動供給誘因效果。

租稅對經濟成長之影響，如區分直接稅與間接稅，實證結果發現兩者對經濟成長之影響未有一定結論。Auerbach and Kotlikoff (1987) 以動態財政政策結構模型分析，結果顯示消費稅比所得稅更能刺激儲蓄與資本形成。Wang and Yip (1992, 1995) 研究亦顯示消費稅對經濟成長產生正面影響，而所得稅對經濟成長則有負面影響，並認為以租稅結構分析較能觀察租稅政策對經濟成長之影響。Kocherlakota and Yi (1996) 以美國資料分析 (1917 年至 1988 年)，實證結果指出個人所得稅最高級距法定稅率及關稅有效稅率對美國經濟成長之影響皆不顯著。Angelopoulos et al. (2007) 也以 OECD 國家 (1970 年至 2000 年) 分析，實證結果發現即使以不同衡量租稅負擔之方式，政府生產性支出皆會增加經濟成長率，且不同稅率對經濟成長影響程度亦不同。Mendoza et al. (1997) 以 OECD 國家資料分析 1965 年至 1991 年間，實證結果為消費稅與投資率呈正相關，而勞動所得稅、資本所得稅與投資率呈負相關，惟此 3 種租稅有效稅率對平均每人產出成長率影響效果皆小且不顯著。

Engen and Skinner (1996) 租稅政策可能減緩研究發展及高科技產業之發展，

而這些項目具潛在外溢效果，能提升現有勞動力及生產力。同時指出勞動力會避免受雇於生產力較高但課稅較重之部門，因而扭曲人力資本之利用。投資者會選擇對投資課稅較輕之部門，進而影響資本邊際生產力。

從租稅結構與經濟成長來看，Harberger (1964) 認為租稅對經濟成長沒有影響，亦即租稅政策無法影響長期經濟成長。Skinner (1987) 認為政府透過稅制改革以增加稅收，具有減少財政赤字效果，可以減輕財政壓力，並促進經濟成長。另一方面，租稅對經濟體系所造成之扭曲將對經濟成長造成不利影響，而租稅結構之完善設計可能帶來正面效果。Yamarik (2000) 以美國 48 州之所得稅、消費稅及財產稅邊際有效稅率推估，結果顯示所得稅及財產稅等直接稅對經濟成長有負面影響，消費稅效果則不顯著。Myles (2000) 也認為租稅結構變化對經濟成長之影響較租稅負擔率顯著。

而 Branson and Lovell (2001) 則以間接稅稅收占直接稅稅收比例，探討租稅結構對經濟成長之影響。另外，Shevlin and Porter (1992) 認為租稅改革亦對公司有效稅率產生影響。

由上述文獻可知，如以租稅負擔率探討租稅政策對經濟成長之影響，正負效果抵銷之結果，較難看出租稅政策效果，且未有一致結論。然而須注意的是，不同稅制所影響層面亦不同，此可能是造成無法明確解釋稅制與經濟成長間關係之原因。

### 參、研究模型的建立

本文採用 Liu et al. (2013) 研究模型，以競爭輸入型<sup>8</sup> (competitive import type) 分析實施「適時調整稅制」方案帶動各產業間之影響，以及推估各項經濟效應。在推估經濟波及之過程中，可分為直接波及與間接波及<sup>9</sup>兩部分。

首先建立產業供需均衡方程式如 (1-1) 式：

$$\sum_{j=1}^n a_{ij} X_j + F_i^d + E_i = X_i + M_i, i = 1, 2, \dots, n \quad (1-1)$$

<sup>8</sup> 競爭型產業關聯模型係將進口商品與國產商品視為具有同性質之競爭關係。

<sup>9</sup> 而間接波及效果又有第 1 次波及效果、第 2 次波及效果、第 3 次波及效果……，本文推估至第 2 次間接波及效果。



其中， $a_{ij} = \frac{x_{ij}}{X_j}$ ， $i, j = 1, 2, \dots, n$ ， $a_{ij}$ 為 $j$ 產業生產1單位時，必須投入 $i$ 產業量之投入係數（input coefficient）。投入係數又稱為產業之技術係數（technical coefficient）； $x_{ij}$ 為產業部門之中間交易額； $FD_i$ 為 $i$ 部門最終需求額，由國內需求 $F_i^d$ 與國外需求 $E_i$ 所組成； $X_i$ 為 $i$ 部門生產額； $M_i$ 為 $i$ 部門輸入額。 $M_i$ 定義如下：

$$M_i = m_i(\sum_{j=1}^n a_{ij}X_j +), i = 1, 2, \dots, n \quad (1-2)$$

其中， $m_i$ 為輸入係數。由(1-1)式可得出以行列（matrix）表示之競爭輸入型產業關聯模型，如(1-3)式。

$$X = [I - (I - \bar{M})A]^{-1}[(I - \bar{M})FD + E] \quad (1-3)$$

其中， $A$ 為 $n \times n$ 的投入係數行列（input coefficient determinant），其定義如下：

$$A = \begin{bmatrix} a_{11} & \cdots & a_{1n} \\ \vdots & \ddots & \vdots \\ a_{n1} & \cdots & a_{nn} \end{bmatrix} \quad (1-4)$$

$I$ 為單位行列（identity matrix）； $\bar{M}$ 為輸入係數 $m_i$ 之對角行列（diagonal matrix）；而 $I - \bar{M}$ 代表臺灣產業自給率。

設 $[I - (I - \bar{M})A]^{-1} = \theta_{ij}$ 時，(1-3)式可以寫成 $X = \theta_{ij}[(I - \bar{M})FD + E]$ 。

「財政健全方案」之經濟效應涵蓋經濟波及效果外，尚有附加價值誘發額、勞動所得誘發額及就業創造，模型的建立如下：

## 一、產業關聯波及模型

### (一) 直接效果與第1次間接波及效果

直接效果為推動「財政健全方案」所引發國內最終需求增加額( $\Delta FD_1$ )與自給率( $I - \bar{M}$ )之乘積，即：

$$(I - \bar{M})\Delta FD_1 \quad (1-5)$$

第 1 次間接波及效果：由直接效果 $(I - \bar{M})\Delta FD_1$ 與 Leontief 逆矩陣乘積，得出：

$$\Delta X_1 = \theta_{ij}[(I - \bar{M})\Delta FD_1] \quad (1-6)$$

## (二) 第 2 次間接波及效果

計算第 2 次間接波及效果時，須先估算雇用者所得率(W)。產業 j 雇用者所得率 $w_j$ 為 j 產業雇用者所得 $(v_j^w)$ 除以該產業總投入額 $X_j$ ，可以 (1-13) 式表示：

$$W = [w_1 \ w_2 \ \dots \ w_n], w_j = \frac{v_j^w}{X_j}, j = 1, 2, \dots, n \quad (1-7)$$

由上式可計算誘發之雇用者所得為雇用者所得率(W)與第 1 次間接波及效果 $(\Delta X_1)$ 之乘積，即：

$$W\Delta X_1 \quad (1-8)$$

而新增加之消費支出為：

$$\bar{c}W\Delta X_1 \quad (1-9)$$

其中， $\bar{c}$ 為 2012 年最低 20%所得家庭平均消費傾向 (APC) 0.90。

因此，各產業第 2 次之最終需要增加額可寫成：

$$\Delta FD_2 = C\bar{c}W\Delta X_1 \quad (1-10)$$

其中，C 定義如下：

$$C = \begin{bmatrix} c_1 \\ \vdots \\ c_n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FD_{(c)1} \div (\sum_{k=1}^n FD_{(c)k}) \\ \vdots \\ FD_{(c)n} \div (\sum_{k=1}^n FD_{(c)k}) \end{bmatrix} \quad (1-11)$$

由上式子可建立第 2 次間接波及效果：

$$\Delta X_2 = \theta_{ij}[(I - \bar{M})C\bar{c}W\Delta X_1] \quad (1-12)$$

附加價值誘發額由「財政健全方案」所產生之直接國內需要增加額乘以粗附加價值率( $w_j^G$ )。即，直接粗附加價值誘發額 =  $w_j^G(I - \bar{M})\Delta FD_1$ ，間接粗附加價值誘發額 =  $w_j^G\theta_{ij}(I - \bar{M})(\Delta X_1 + \Delta X_2)$ 。

### (三) 經濟波及總效果

由(1-5)式、(1-6)式與(1-12)式推估經濟波及總效果，如(1-13)式所示：

$$(I - \bar{M})\Delta FD_1 + \Delta X_1 + \Delta X_2 \quad (1-13)$$

### 二、就業創造模型： $\Delta L_i = [(I - \bar{M})\Delta FD_1 + \Delta X_1 + \Delta X_2] * H_i$

欲估算就業人數須先計算各產業就業係數，可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各產業就業人口總數與產業關聯表中各產業總生產值推估而得。

當 $L_i$ 為生產 $X_i$ 之必要勞動力投入， $H_i$ 為雇用係數之對角行列(diagonal matrix)，

三者間關係為：

$$H_i = \frac{L_i}{X_i} \quad (1-14)$$

估算稅制改革所創造就業人數為：

$$\Delta L_i = [(I - \bar{M})\Delta FD_1 + \Delta X_1 + \Delta X_2] * H_i \quad (1-15)$$

上述模型建立流程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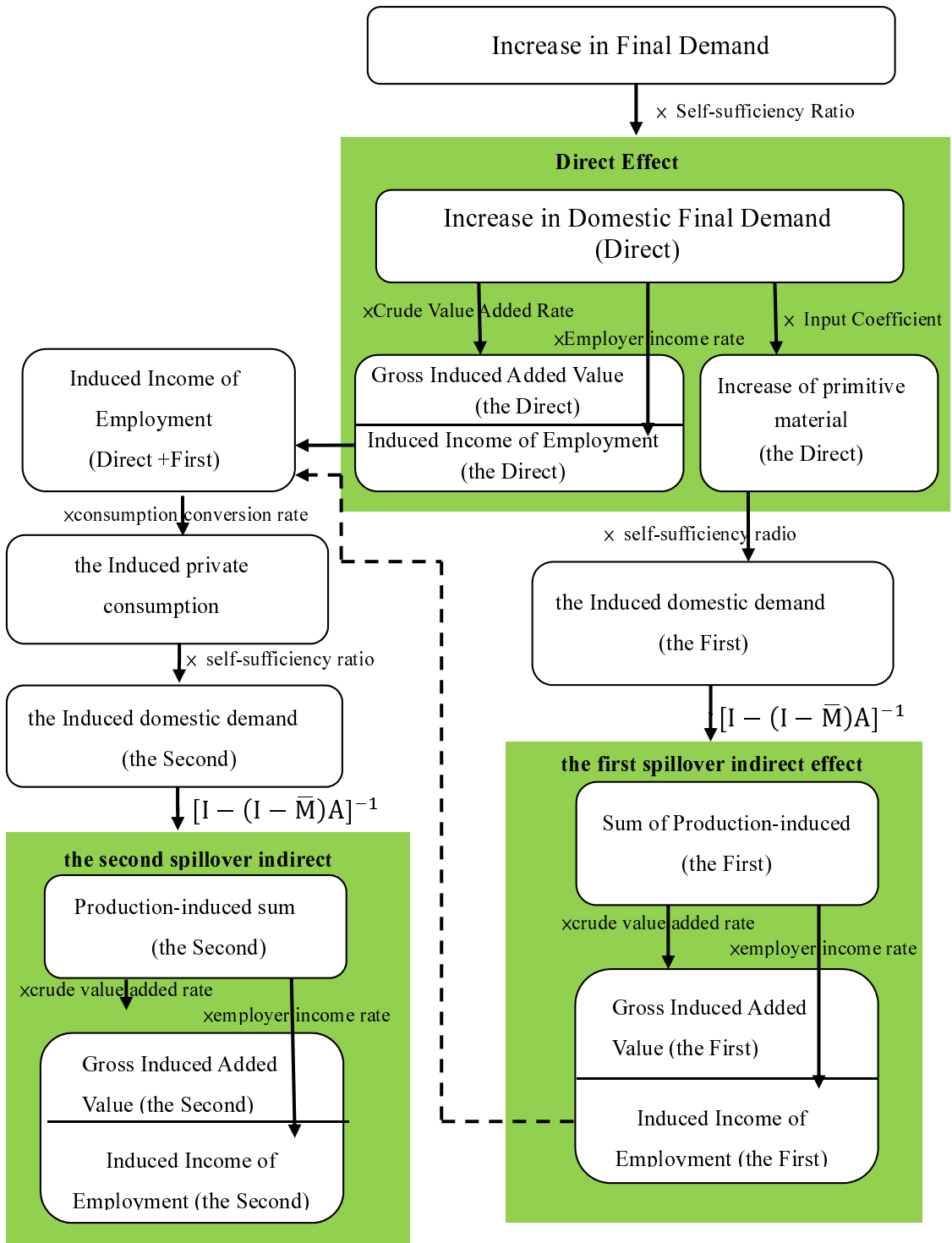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模型推估流程

## 肆、實證結果

如前所述，本研究設定 3 項議題以推估其經濟效應，分別為：

- (一) 推估稅收用於移轉性支出之經濟效應。
- (二) 推估稅收用於公共支出之經濟效應。
- (三) 推估提高特別扣除額之經濟效應。

前 2 項係以「財政健全方案」之「適時調整稅制」為基礎，推估稅收用途差異性所產生之經濟效應；第 3 項則以提高特別扣除額增加可支配所得，估算擴大消費所產生之經濟效應。

### 一、稅收用於移轉性支出之經濟效應

「適時調整稅制」之實施，增加 700 億元國庫稅收，稍微減輕財政赤字，當增加之稅收用於補助弱勢家庭，所產生之各項經濟效應如表 2 所示。

表 2 稅收用於移轉性支出之經濟效應

產業	總經濟效果 (億元)	附加價值誘發額 (億元)	勞動所得誘發額 (億元)	就業創造 (人)
農業	42.68	25.65	15.68	5,837
工業	288.17	120.91	59.66	7,351
服務業	995.10	717.46	377.56	44,034
合計	1,325.94	864.00	452.90	57,222

由表 2 可知，創造 1,325.94 億元之總經濟效果，經濟乘數效果達 1.894。由於補助對象為經濟弱勢家庭，不論平均消費傾向或邊際消費傾向較其他高所得家庭為高，因而產生之波及效應相對較大。移轉性支出大多用於與日常生活相關之商品與勞務，因此服務業創造 999.01 億元，占整體總經濟效果 75.05%，其次為工業與農業部門的 288.17 億元、42.68 億元。

在創造附加價值方面，仍以服務業 717.46 億元最多，占全體產業 83.04%。附加價值為業者經營收入，表示「適時調整稅制」之實施為企業創造 864 億元營

業額。另一方面，受雇於這些企業之勞動者亦產生所得變化，由表中「勞動所得誘發額」可知，總計增加 452.90 億元，同樣以服務業勞動者最多，為 377.56 億元。

政府推動稅制改革目的，除增加財源外，亦盼能增加就業機會。如能帶動上述經濟效應，將帶來就業機會。觀察表 2 最後一列，稅收用於移轉性支出之雇用效果有 57,222 人，其中服務業占 76.95%。

## 二、稅收用於公共支出之經濟效應

有別於將稅收用於移轉性支出，投入公共支出所產生之經濟效應如表 3 所示。基礎建設公共工程所產生之產業間關聯，與可支配所得變化產生消費增加所帶動之經濟波及不同。因此，總經濟效果集中於公共工程部門，創造 700 億元之經濟規模，占全體產業 47.63%，服務業僅 304.73 億元，低於工業部門 456.39 億元，其經濟效果與表 2 推估結果具明顯差異，亦說明稅收用途之差異性將使得產業間利益產生明顯不同之分配。農業經濟效益亦明顯不同，僅創造 8.47 億元之經濟規模，占移轉性支出（42.68 億元）19.85%。

表 3 稅收用於公共支出之經濟效應

產業	總經濟效果 (億元)	附加價值誘發額 (億元)	勞動所得誘發額 (億元)	就業創造 (人)
農業	8.47	4.81	3.34	1,157
工業	456.39	127.97	61.66	8,117
公共工程	700.00	159.61	134.26	23,250
服務業	304.73	204.14	119.02	15,100
合計	1469.59	496.53	318.27	47,625

在附加價值創造上，稅收用於公共支出之方式呈現明顯減少，僅增加 496.53 億元，占移轉性支出（42.68 億元）57.47%。如以產業別來看，雖然仍以服務業經營者 204.14 億元為最多，但與表 2 相較已呈現大幅減少。而在勞動所得創造上，減少幅度不若附加價值，但是公共工程部門勞動者所增加金額高於服務業 119.02 億元，此結果也反映在就業人數。就業人數總計增加 47,625 人，以公共工程部門為最多，農業部門與表 2 相較少 4,680 人。

### 三、提高特別扣除額之經濟效應

「適時調整稅制」項目中，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一方面使政府稅收減少，另一方面則使納稅人可支配所得增加，擴大消費並帶動經濟成長。財政部推估特別扣除額由 10.8 萬元提高為 12.8 萬元減少稅收為 73 億元，將近 700 萬人受惠。推估其經濟效應如表 4 所示。

總經濟效果為 138.28 億元，如同稅收用於移轉性支出之經濟效應，因減稅而多消費之商品與勞務集中於服務業，因此服務業即占 103.77 億元，附加價值與勞動所得也以服務業最多，分別創造 74.82 億元、39.37 億元之經濟效應。

此外，在創造就業人口方面，總計為 5,967 人，微幅紓緩現今失業率攀高之壓力。

表 4 提高特別扣除額之經濟效應

產業	總經濟效果 (億元)	附加價值誘發額 (億元)	勞動所得誘發額 (億元)	就業創造 (人)
農業	4.45	2.67	1.63	609
工業	30.05	12.61	6.22	767
服務業	103.77	74.82	39.37	4,592
合計	138.28	90.10	47.23	5,967

### 伍、總結

傳統經濟理論談論政府課稅行為時，往往強調課稅將扭曲市場價格而形成效率損失，認為市場的力量可自動調整到最佳狀態以達柏雷托效率（Pareto efficient），此即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主張。然而「財政健全方案」之精神非著重效率性，而是強調公平性，希望達到某些程度之柏雷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即追求公平與福利經濟學第二基本定理（Fairness and the Second Fundamental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之主張。金融危機造成我國經濟低迷與失業率攀升，此時實施「適時調整稅制」將有助於財政收入與公平性，因為銀行已恢復正常的財務結構狀態，縱然恢復先前 5%營業稅率亦不致於造成金融機構經營策略重大改變。此外，稅

制改革如能善用稅收，亦將獲得相當水準之經濟波及效應，此由本文數理模型推估獲得初步證明。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1. 江振南、陳韻如 (2004)，「經濟增長與稅收負擔 VAR 模型之實證研究」，《財稅研究》，第 36 卷第 1 期。

### 二、英文部分

1. Angelopoulos, K., G. Economides and P. Kammass (2007), Tax-spending Polici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nd Evidence from the OEC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3, 885-902.
2. Auerbach, A. J. and L. J. Kotlikoff (1987), *Dynamic Fiscal Polic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Branson, J. and C. A. K. Lovell (2001), "A Growth Maximizing Tax Structure for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8(2), 129-146.
4. Barro, R. J.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a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2), 103-25.
5. Barro, R. J. (1991), "Economic Growth in Cross-Section Countr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407-433.
6. Chin-Hung Liu, Cheng - Yih Hong\*, Jian-Fa Li (2013), "An Industry-related Spillover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nese tourists on the Taiwanese economy." *Tourism Management*, vol. 36, pp. 423-425.
7. Creedy, John and Gemmell, Norman (2005), "Publicly Finances Education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32(2), 114-131.
8. Dotsey, M., (1990),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Production Taxes in Stochastic Growth Mode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1168-1182.



9. Easterly, W., (1993), "How Much Do Distortions Affect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 187-212.
10. Engen, E. M. and J. Skinner (1996), "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582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1. Harberger, A. C. (1964), "Tax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Welfare." in *The Role of Direct and Indirect Taxes in the Federal Revenue System*, NBER and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e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2. Heckman, J. J., (1976), "A Life-Cycle Model of Earnings, Learning, an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4(4), 11-44.
13. King, R. G., and Rebelo, (1990), "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Developing Neoclass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26-150.
14. Kocherlakota, N. R. and K. M. Yi (1996), "A Simple Time Series Test of Endogenous vs. Exogenous Growth Models: An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8(1), 126-134.
15. Koester, R. B. and R. C. Kormendi (1989), "Taxation, 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some supply-side hypotheses.", *Economic Inquiry*, 27, 367-38.
16. Lucas, R., (1990), "Supply-Side Economics: An Analytical Review."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2, 293-316.
17. Mendoza, E. G. and G. M. M. Ferretti, and P. Asea (1997), "On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ax Policy in Altering Long-run Growth: Harberger's Superneutrality Conjectur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6(1), 99-126.
18. Milesi-Ferretti and Roubini (1998) "Growth Effect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Taxes: Positive and Normative Analysis." *NBER Working Paper*, no. 5371.
19. Myles, G. (2000), "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iscal Studies*, 21(1), 141-168.
20. Rebelo, S., (1991), "Long-Run Policy Analysi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500-521.

21. Romer, P. (1989),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3137.
22. Shevlin, T. and S. Porter, (1992), "The Corporate Tax Comeback in 1987-Some Further Evid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58-79.
23. Skinner, J. (1987), "Taxation and Output Growth: 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35.
24. Sylwester, K. (2000), "Income Inequality,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3, 379-398.
25. Trostel, P.A., (1993), "The Effect of Taxation on Human Capit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327-350.
26. Wang, P. and C. K. Yip (1992), "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Taiwa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1(3), 317-331.
27. Wang, P. and C. K. Yip (1995),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actor Taxation with Endogenous Human Capital Evolu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1(3), 803-818.
28. Yamarik, S. (2000), "Can Tax Policy Help Explain State-Level Macroeconomic Growth?" *Economics Letters*, 68(2), 211-215.